

傅山的“逸气” 及其审美心理分析

□ 王东声

在明末清初,傅山代表着一种“独特”的存在。在 17 世纪的那段历史中,有着遗民身份的并非傅山一人,然而,傅山以其坚决不与时处的清廷为伍的刚正执拗的性格,广博的涉猎与传奇的经历,及至书法上诡异放肆的异体字和行草书,以及具有“反叛”特质的审美观,都使其在当时的时空之下呈现出“独特”的品质和“独特”的意味。可以说,傅山的“独特”品质和意味正源于中国士人的“逸气”追求。

“逸气”与“逸心”,人所共有之。但是,生存的现实、欲望的满足与精神的自由之间总是交互纷杂,其也正是儒、释、道三种哲学体系之所以产生并相互依存发展的缘由所在。“逸气”者,源于隐逸之心,并须有隐逸之为,而其后方位“逸格”,再后形诸于艺则升“逸品”之列。由隐而逸,心隐是前提,身隐是形式,逸气、逸格与逸品则是形式之彰显。当然,有“逸气”不一定完全能生发出“逸品”,但无“逸气”是断不能产生“逸品”的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说:“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。”邦有道则知,邦无道则愚。“邦有道则仕,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而《后汉书·逸民列传》序言“(隐士)蝉蜕嚣埃之中,自致寰区之外,异乎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!”就讲到人与社会之间相合与相违的处境下所采取的不同态度,说明隐士已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一股否定力量。而隐士之隐,有的是因为“邦无道”才归隐,有的是“托薜萝以射利,假岩壑以钓名”(《旧唐书·隐逸传》),方式各异,心态也不尽相同。“邦无道”则表现在“邦”本身“无道”,也表现在因此而致社会精英因“矢志”令抱负难以施展而弃仕退隐。如孟浩然为考取功名曾长期隐居,“苦学三十载,闭门江汉阴”(《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侍郎》),后又因为应试未第,仕途不畅,遂归田隐居。如此事例多多,史上不乏其人。

一般情况下,充满志向和抱负的儒家士人即初

如孟氏,为出仕而苦读书,但若不能登第或登第后不能显达,或世事变幻,中途遭贬,被主流社会放逐或抛弃,仕而无途,易发隐逸之心。所以,士人会因为得不到赏识或被迫淡出权力中心就会感到痛苦与失落,也会在退隐后因远离主流社会而怅惘若失,所以有“出世”的道济见驾与北上的“期待”,退隐者的心理总是复杂而矛盾的。显然,这其中总有欲壑未平而心理“不平衡”之纠缠,此亦即社会与人之间永难调和的矛盾与复杂性之所在。

可以说,傅山的内心充满了矛盾,尤其是经历了王朝更迭之后。然而,家学的涵养以及个人性情中具有狂狷耿介品质的“逸气”,都促动他对世事、对作学立论的所思、所想、所作都非同一般。故此,傅山的思想底色即以“反其道而行之”,尤其在文化审美意识上表现出强烈的逆反心理和叛逆思想。

傅山世出官宦书香之家,家学甚有渊源,祖辈政绩非常,而其父傅子谟长于治学却终生不仕。傅山从小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,后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指教,袁氏主张“立法严而用意宽”。其治学宗旨与精神信仰上提倡重修为、重气节的理念,对傅山影响颇深。而 31 岁时步行赴京诉冤请愿并最终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的事件,使傅山得以名震京师乃至大江南北。这场被称为“伏阙讼冤”的事件虽然以成功告终,但对傅山来讲,却让他对官场世态失望至极。其后,返回太原的傅山,就象被朝廷罢官归隐的祖父和终生不仕的父亲那样,无意于官场仕途,在城西北寻辟一处书斋,悉心研读古书,专志于学问修为,后曾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。

虽然心存对朝廷的不满,但在明亡之后,傅山仍写下“哭国书难著,依亲命苟逃”的诗句,不仅出家为道,身着红色道袍,自号“朱衣道人”,这暗含他对亡明的怀念,也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强大,早日北上反清复明。另外,他自身也积极联系反清势力,密谋策划,

积蓄力量,伺机谋反。然而,就像很多国破家败的遗民们一样,傅山的出家非出本心,而是无奈之举。这里,除显示出傅山的重气节之处,也反映出他是藉“出世”以求安身立命,并为达到抗清复明作准备。可以说,明清异代的变故造成了身心的巨大痛楚,然而,性格上的孤傲狂狷,理念上却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,二者又不无矛盾。傅山也遭遇着仕与隐的矛盾,即想寻求一方世外净土,又不甘于寄生于清廷门下。毕竟,逃禅只是形式而已,入道的目的既为保身,也为了伺机反抗清廷。

当然,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,虽然隐居深山,但傅山并不是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,而是在“一心只读圣贤书”中对“圣贤书”进行个我解读,不断著书立说,对严重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专制文化进行激烈批判。他倾注大量心力,批注和研究先秦诸子学说,批判“程朱”理学,提出“经子齐观”论和“复古为解放”口号,主张“经世致用”的实学,希望以此批判和改造当时的社会。在清朝之后诸子学说研究领域,傅山占有重要地位。

另外,傅山在书法、绘画、医学、文学、美学、哲学等方面均有所涉猎和研究,人品、学问俱佳,很多高学名士都过访他。其书法被时人尊为“清初第一写家”,并被列入“逸品”之列。他的画境界很高,多作山水、梅、竹、兰等。画家戴本孝专门到山西拜访他,后来还有诗画合璧册流传,这些都会促进双方绘画的交流与提高。《画征录》也记载:“傅青主画山水,皴擦不多,丘壑磊珂,以骨胜,墨竹也有气。”顾炎武也曾慨叹不如傅山“萧然物外,自得天机”。

显然,傅山的“宁拙毋巧,宁丑毋媚,宁支离毋轻滑,宁直率毋安排”主张,不只拘于书法之一科,而是其美学观点的整体涵义所在。这里,既是对旧有大众审美观念的批判,不甘仕清的逆反心理也起到了一定作用。清代史学家全祖望认为“君子以为先生非止言书也”是不无道理的。

傅山自谓其书“弱冠学晋、唐人楷法,皆不能肖,及得松雪、香山墨迹,爱其圆转流丽,稍临之,则遂乱真矣。”然而,他鄙视赵孟頫,也鄙视王铎的“贰臣”之流。谓:“松雪何尝不学右军,而结果浅俗,至类驹王之无骨,心术坏而手随之也。”(《霜红龕集》)后其改学颜真卿,认为“作字先作人,人奇字自古”,“平原气在中,毛颖足吞虏”(《训子帖》),甚至达到“常临二王,书羲之、献之名几千过,不以为意。唯鲁公姓名写时,便不觉肃然起敬,不知何故?”显然是出于

尊仰颜之气度、人格,亦即儒家正统思想潜移默化使然。可以说,这种择帖的转变和易代有着某种潜在的关联,是颜真卿的“忠”与“义”的“象征资源在适当的政治情势下极容易被再度唤醒并加以利用”(白谦慎语)。楷书册页《阿难吟》有明显的颜书风格,而《啬庐妙翰》中的楷书则将“宁支离”的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,结字与章法均做了先“解”而后“构”的处理,气象上松散、杂乱,毫无规矩。《游仙诗》则对篆籀文字加以戏拟,可列“草篆”一说。其实,其中的游戏成分大了些,行笔速度很快,有的条屏点画轻虚,如蜻蜓点水,一带而过,完全是一种“逍遥自适而已”甚至“不以为然”的态度书就。

于此作一比较,或更有利于我们释读傅山书法。从那个时代的学术特质和美学追求上看,同样是尚奇崛豪纵的审美追求,傅山和王铎的书法确实有某些形貌上的相合之处,论年龄和声望,最初傅山受到王铎影响也是自然的事情。但比较而言,王铎书法点画沉实果断,顿挫感更强,相对更规矩,更讲究法度,在“不越矩”的状态下发挥跌宕张扬的书写气势,在二王一系行书实践中再启新章。而傅山的美学思想显然是“破坏性”的,他不遗余力地寻求异常之法,尤其是草书创作。他对于晋之二王,唐之旭、素,对于宋之米南宫、黄山谷,明之祝枝山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读和临习,而对于唐之颜真卿和明之徐渭则有某种心理上的契合,书写起来不在乎一点一画是否遵规守矩,在字势与章法上追求狂怪与险绝,其奔雷坠石般的狂飙气势足以给人以视觉上的震撼。其草书字型圆转,畅达,对线的运用是率性而为,意气风发,即使是运笔转折处也常常极少顿挫,靠左右摆荡与翻转的动作来纵驭笔毫,以保持书写的流畅感与连贯性。如其最具代表性的《五峰山草书碑》所缠绕连绵的程度,超出凡想。

应该说,王铎的突出之处在于行书和行草,傅山则主要是草书上卓富成就;从审美情趣上细划之,则王铎显得理性,傅山更感性一些;王铎的笔墨形态重力度,更“实”;而傅山书法则尚韵味,走“虚”;王铎极力在“戴着镣铐舞蹈”;而傅山则是毫无挂碍,心无旁骛,全不顾及;王铎显得“现实主义”的成分大,活在“现实”之中,作品呈现的形态更世俗一些,而傅山意在山林,啸傲江湖,气节坚贞,作品上少有烟火气;另外,在朝代更迭之后的处世方式上,王铎很矛盾,并最终入“仕”,傅山则坚决不从于新政,而是选择了“隐”于山林和市井之间。如此,都反映了二人的性格

与精神信仰上的差异。当然,不能就此就简单地认定哪一方正确与否,在很大程度上,判断作品也不是简单地论为孰好孰坏的问题。毕竟,人的生命形态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,而本文也无意于此探讨。

综而言之,傅山品性孤高,注重忠义和气节,从反对“奴性”、“奴气”乃至“俗气”的道德标准可以看出,是传统士人的“逸气”心理、逆向思维和高蹈遗世的情性品操成为了他艺术创作的原动力。无疑,傅山以其遗民学者身份、奇诡的异体字和游戏大方

的连绵草,给那段历史、也给后世留下了生动而传奇的一笔,其对传统文化进行品鉴与研究的重视程度,敢于挑战已有的学术规范,在艺术创作上注意对“自我表现”的珍视与发挥,对今天仍应起到难得的启示。

(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、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部特约研究员)

(上接 127 页)

治法是:“清肝火而扶脾气”,但主补肝之血,全不利脾之湿者,以赤带之为病,火重而湿轻也。夫火之所以旺者,由于血之衰,补血即足以制火,且水与血合成赤带之症,竟不能辨其湿非湿,则湿也尽化而为血矣。”方用“清肝止淋汤:白芍一两醋炒,当归一两酒洗(以上为主药)。生地五钱酒炒(阿胶三钱白芍,小黑豆一两(以上为辅药),粉丹皮三钱,黄柏二钱,香附一钱酒炒,红枣十个(以上为佐药),牛膝二钱(为使药)”。方义:“此方之妙,妙在纯治血,少加清火之味,故奏功独奇,倘一利其湿,反引火下行,转难遽效矣。……用白芍以平肝,则肝气得舒,肝气舒木不克土,脾不受克则脾土自旺,是平肝正所以扶脾耳,又何必加入人参白术之品,以致累事哉!”

主药特重,余药特轻,是特点之二

在《女科》绝大部分方剂中,有一突出的特色是:主药特重,余药特轻甚至奇轻,主药多数一至二两,少数五钱,余药一般一至三钱、或一至六分。正如岳美中所说:“其用药前无古人,该重时用量特重,动辄以两计,该轻时用量特轻,轻到几分。”有人统计了《女科》上下卷共 67 方中,主药(或辅药)10 两 2 方,占 2.99%,2 两以上 9 方,占 13.43%,1 两者 44 方,占 65.67%,五钱者 11 方,占 16.42%,不足五钱者 1 方,占有 1.49%这种用法有两种情形;一是主辅药均特重,余药特轻或奇轻。如《女科·脚下先下难产》治方转天汤,以补气的人参 2 两为主药,补血的当归 2 两,川芎 1 两为辅药,以下行的川牛膝 3 钱,上升的升麻

4 分佐药,用无轻不运气血迅速的制附子 1 分为使药。如此有制之师,其效自然如鼓之应桴。二是主药特重,余药特轻或奇轻。如《女科·正产胞衣不下》,用补中益气汤治之,该方主药生黄芪 1 两补其气,辅药人参 3 钱,当归 5 钱气血双补,佐药白术、莱菔子各 5 升,升麻、柴胡各 3 分,陈皮 2 分以升清降浊,使药甘草 1 分以调和诸药。药证相投,服之何悉胞衣不下!这种配伍法的优点是:重点突出,药专效宏,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发扬。

巧配药对,相辅相成为特点之三

这方面如治黄带的易黄汤中山药与芡实一补一涩,车前子配白果,一利一涩;治正产胞衣不下的补中益气汤中升麻与膝一升一降;治血崩昏暗的固本止崩汤的黄芪与当归一气一血;治经水先后无定期的定经汤中菟丝子与荆芥穗一补一疏;治经前腹疼的顺经汤中当归与白芍一辛散一酸收;治腰酸腹胀不妊的升带汤中鳖甲肉桂一寒一热;治跌闪不产的理气散瘀汤中红花与姜炭一行一止等,无不寓有相反相成之至理深义,值得今后临床进一步研究。

以上六条是我研读《女科》的临床悟见,傅山先生的医学、医术深不可测。仍需同道识士者共同研讨,究其奥秘。

(作者系太原傅山医院院长、太原傅山研究会副会长)